

国家与企业关系再反思

——第四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秦 奋 张静宜 祝 伟

2023年10月13—15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商业史学会联合主办,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史研究中心承办的“国家与企业关系再反思——第四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成功召开。本次会议旨在重新关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企业史的研究中“找回国家”,一方面关注国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企业如何处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上述两个层面在历史中的表现和演变。

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利民,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涛,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先后致辞,均充分肯定了研讨会的主题。哈佛商学院杰弗里·琼斯(Geoffrey G. Jones)教授也为研讨会特别录制了视频,预祝会议取得成功。研讨会聚焦10个主题,共收录90篇论文。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以及新加坡、日本等70余所海内外著名高校及科研机构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一) 企业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

企业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对其研究方法与范式演变的反思引起多名与会学者的兴趣。李培德(华侨大学)指出中国企业史研究可以借鉴欧美、日本企业史的发展道路,结合国内具体情况,发展出适合中国的企业史研究范式。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一种企业史研究的新范式——“以企业为中心的企业史研究”,认为要具体而微地研究企业的行为,突出企业史研究相对于经济史研究的独立性。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总结了西方企业史学家身份认同变化的主要节点以及西方企业史主流方法论的演变轨迹。林彦樱(日本弘前大学)以日本经营史为例,尝试厘清日本的经营史研究与产业集聚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熊金武、沙娅和侯冠宇(中国政法大学)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指出中国企业史目前集中于企业史与经济史、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史跨学科研究。

(二) 中国共产党与企业关系研究

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政策在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魏众(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广大华行等4家党产机构为中心,讨论了1940年后党产的出现背景、筹集方式及作用。强舸(中共中央党校)认为国有企业内部党的领导体制和企业的职能定位的不同是造成企业间党组制度出现差异化的原因。张悦(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以太原钢铁厂为研究对象,指出党的教育和宣传对于改造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具有重要作用。王修晓和凌超(中央财经大学)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政治吸纳和党组织嵌入对提高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具有积极影响。张保军(中国人民大学)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无锡县社队企业的发展过程及内因。在三线建设的研究方面,王毅(四川外国语大学)肯定了三线建设对云贵地区工业化的积极影响;黄巍(辽宁大学)综合小三线企业史的研究内容、史料使用和研究趋势等方面讨论了相关研究的得失;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以原电子工业部直属国

[作者简介] 秦奋,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2206,邮箱:qinfencufe@163.com。张静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00,邮箱:zhangjingyi9707@163.com。祝伟,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北京,102206,邮箱:zhuwei@cufe.edu.cn。

营某厂为例,认为适应性战略使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过分侧重短期效益,导致企业无法形成竞争性优势;周升起(鲁东大学)总结了上海小三线企业违反财经纪律问题背后折射出的国企管理逻辑与激励机制。

(三)金融企业发展研究

张徐乐(复旦大学)梳理了近代上海钱庄200余年的历史沉浮,强调了上海钱庄顽强的生存能力。黄传荣(重庆工商大学)以近代湖北官钱局的破产与官票救济的失败为例,认为政府应明确权力的使用边界。张宸(西南大学)以聚兴诚银行为例,回溯了公私合营过程中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王玉茹和裴丽婕(南开大学)梳理了近代华资银行信息调查事务的发展过程,认为信息调查事务的兴起有助于银行管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孔令宇和张文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近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说明其与当代工业化国家的银行具有类似的招聘策略。钟钦武(中国海洋大学)和李健魁(山东师范大学)以北海银行为例,论述了中共在战时对金融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张静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提出经济困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利用外资银行的主要原因。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制度与实践

从企业发展和管理制度演变等视角出发,对新中国企业制度与实践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林超超(复旦大学)从1952年上海大东烟厂事件出发,指出随着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介入加深,在某些情况下,工人的斗争对象会由企业资方转向地方干部。祁瞳瞳和关永强(南开大学)认为集体主义时期,天津市街道妇女在家务和街道生产劳动之间的盘桓进退对再生产劳动和生产劳动的性别分工秩序造成冲击。贾文娟(上海大学)认为国有企业用于解决市场效率和社会合法性追求矛盾的二元劳动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根植于中国的资源分配逻辑之中,但其并不能彻底解决该问题。雷鸣和杜金泽(南开大学)发现社会网络和上层建筑能够化解劳资矛盾。徐岚(厦门大学)认为20世纪50—80年代闽南地区制糖工业的亦工亦农制度虽然解决了制糖业劳动力的短缺和滞存问题,但并未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王思霓和吴继飞(中山大学)发现国营企业建立的完整工业体系对民营企业的兴起具有正向影响。赵晋(华东师范大学)梳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火柴业的发展过程和失败原因。李蔚暄(华东政法大学)以上海国营棉纺织企业为例,说明与工资政策的矛盾是造成新中国工资制度改弦更张的根本原因。吴盛杰(南京大学)从政治、政策和业务三个方面分析了1952—1953年南京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陈碧舟(上海大学)发现没有正确贯彻政府的改革意图是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在改革过程中失败的原因。阎瑞雪和王于鹤(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外部供给约束和劳动力过剩是改革开放初期影响企业办社会程度的重要原因。

王毅(浙江大学)认为“四马分肥”的分配方式和商定过程反映了中共对私营工商业的全方位接管。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朱妍(上海社会科学院)聚焦计划经济时期的外包现象,分析了国营企业外包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姜子莹(厦门大学)、封凯栋和陈俊廷(北京大学)认为美国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经历着从“创造市场”到“修补市场”的角色转变。陈弢(同济大学)以大众集团为例,揭示了中国的政治和技术精英与中外合资企业的博弈过程。

(五)传统中国经济组织研究

王珏和白天鹏(中国人民大学)认为清代景德镇御窑财务奏销制度体现了成本管理意识,但这种制度不利于技术的进步。周亚和贾欣潮(山西大学)以万金账为中心考察了清代晋商股俸制的优劣。王国晋(上海交通大学)分析了清代徽商志成号的会计制度,认为传统会计制度降低了私人关系侵蚀商业资本的可能性。余康(新加坡国立大学)以两浙引盐运销为例,指出利用国家建立的盐政制度是商人参与长途贸易及构建跨区市场的重要方式。韩燕仪(中山大学)认为清后期官定盐价制度的成

功实施依赖于官营体制和国家的流通管制。李进辉(厦门大学)运用量化分析方法评估了晚清中国电报商局的经营情况。

(六) 历代政商关系

以中国古代盐业为研究对象,雷鸣和郑凤阳(南开大学)、邓宏图(广州大学)认为食盐专卖制度是政、官、商三方博弈的结果,也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最优运行方式。叶锦花(北京师范大学)指出市场逻辑才是盐商等市场行为主体决策的主要依据。钱晟(上海财经大学)发现牙行呈现出被官府剥削、同时又剥削普通商民的两面性。邵钢锋(浙江工商大学)认为“浙商”一词包括了龙游商、宁波商、绍兴商等,他们主要活跃于两浙、两淮、上海、天津等地,与政府同样有紧密联系。栾笑扬(香港大学)和翟润卓(中国人民大学)发现儒家官僚文化导致宋元时期中国功利主义思想的失败。颜松漳和杨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指出在中国传统的政商关系中,为了防止商人攫取政治权力,政府不允许商人集财富与权力于一体。赵伟(苏州科技大学)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生产精细化严重落后的原因是民族企业、社会和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没有相互支持。李玉(南京大学)提出“政”和“企”都是影响轮船招商局政企关系走向的因素,招商局和政府之间的互动是从“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的过渡。杨向昆(郑州大学)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行政手段干预民营航业来实现国营与民营的合作,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赵海峰和朱正业(安徽大学)基于举债赈灾与官商博弈的视角,重新梳理了1931年赈灾借债的争议过程与实践成效。马腾(华中师范大学)以轮船招商局上海金利源码头为例,强调舆论对政企关系的影响。

(七) 近代企业治理结构与资本市场研究

牛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袁为鹏(上海交通大学)通过考察近代中国企业商标权保护的实效,发现近代中国企业的商标维权意识较晚清有明显提升。李庆宇(合肥工业大学)认为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内部人控制”与相关法规的不完备是“寄生公司”存在的主要原因。段志鹏(太原科技大学)认为西北实业公司在经历了两次治理转型后,建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朱冰冰和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以清末浙江铁路公司为例,认为清末中国商人既有的社会网络与商业传统有能力整合民间资本,形成现代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曹宁(福建师范大学)以福建农林公司为例,分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混合经营制度的优势以及公司最终失败的原因。

龚宁(天津社会科学院)提出疏浚机构因其自身性质的特殊性,使其在抗日期间展现出与其他企业不同的发展模式。闫伟峰(中央财经大学)梳理了全面抗战时期的儿童保育工作。张祥梅(华中师范大学)指出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使国营商业机构福生庄的管理和经营方式逐渐行政化。韩竞铖(厦门大学)则认为煤炭统制政策带来了良性的政企关系,促进了公营煤矿企业的发展。周宗根(江西师范大学)分析了花纱统制政策下大生纱厂与日汪政府的博弈过程,认为代理董事长陈葆初帮助大生不被日方吞并的同时,规避了抗战胜利后的“敌伪资产”清算。黄河(南京大学)以兴业公司为研究对象,论述战时国家资本在地方企业中的扩张过程。梁善明(广西民族大学)探讨了蒋桂关系合离演变影响下广西公营电业的整合及实效,分析后方国营与省营企业的互动关联对广西经济抗战的影响。

沈嘉文(华中师范大学)指出战后上海银团为恢复盐业做出了贡献,但其作用受到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袁逸颖(南京大学)以战后无锡机器缫丝业为例,分析了国民政府的管制政策对该企业的积极影响。陈涛(嘉兴学院)考察了1947—1949年的中国茶业联营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国民政府兴办官商合股企业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设想因受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而难以实现。冯浩然(中国人民大学)以广东顺德糖厂为例,强调地方社会在国营事业民营化过程中的作用。

(八)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研究

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创新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韩晓璇(贵州大学)发现近代银行

家的创新精神对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以及金融制度的变化等方面有推动作用。葛吉霞(常州大学)梳理了以刘国钧为代表的实业家对战后本土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周孜正(华南师范大学)和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总结了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魏晓锴(山西大学)指出晋华纺织厂通过推广以先进工作法为中心的操作技能,实现了从操作技能提升到技术革新的突破。蔡宁伟(中信银行总行)与葛明磊(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以“孟晚舟事件”为例,提出在企业印象管理中企业和企业家的叙事策略为:企业“以理服人”而企业家则“以情动人”。李晓(中国政法大学)认为冒险家或风险承担者并不是马歇尔对企业家的真实看法,企业家的真实面目是厌恶、规避、驾驭风险的。牛澎涛(复旦大学)分析了胡光墉破产清算案中胡光墉和左宗棠之间“亦公亦私”的官商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晚清政商交往的缩影。柴毅(云南大学)详述了治生学的理论框架,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农本社会微观个体通过流通理论实现治生的高度凝练,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体呈现。

(九) 中外经济交流视野下的企业史研究

中外经济交流视野下的企业史研究为深入了解国际经济关系和企业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巫云仙和张春华(中国政法大学)认为巴西国有企业是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主要政策工具。张跃(宁波大学)和杨振子(华中师范大学)以近代中美蛋品贸易为例,发现美国提高中国蛋品关税虽然给美国国内蛋品工业带来了利益,却损害了美商进出口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吴赟(日本周南公立大学)介绍了日本援华“工厂现代化计划”项目,认为该项目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周坤(首都师范大学)认为20世纪初丹麦大北羽毛公司在一战后凭借有效的错位竞争策略与经营方式,探索出一套既适应本地市场、又可与中外政治经济势力周旋的商业策略。郭爱民(南京师范大学)详述了日本公司对永利铔厂的三次调查过程,并根据调查信息制定了霸占永利铔厂生产化肥、控制中国农业的侵略计划。张立朋(山东大学)以中日合办鲁大矿业公司为例,揭示了近代中外合办公司创立过程中繁杂的外交交涉和利益博弈。

(十) 东北地区企业发展与变革研究

东北是近代工业重镇,因此,针对东北地区的企业、商会研究对理解中国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楠和刘晓敏(复旦大学)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商会的设立推动了近代东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张弘毅(北京师范大学)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干涉东北关税自主的史实,揭示了东北海关危机演进的内在逻辑。叶磊(中山大学)认为上海金票买卖活动所引发的投机活动,推动日本、上海、大连三地之间形成了与贸易决算关系不吻合的资金“逆流”现象。刘亦师(清华大学)认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居住区的建设是中国建筑(群)的多样性、完整性和现代性三方面的成功尝试。于之伟(辽宁大学)认为不应对鞍钢宪法过度解读,对其评价应尽量客观。杨宏玉(中央财经大学)梳理了鞍钢殖民“移植”与“本土化”的磨合过程,认为企业发展不能只依附外部力量,还要基于自身特点来完成对外来现代化要素的本土化吸收。

本届会议相比于前三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规模更大,参会论文数量更多。参会论文通过深入且详尽的历史分析、个案研究、量化分析、文献研究和跨学科交流等多种研究,激发了与会者对“国家与企业关系”新的思考,加深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理论认识。

(责任编辑:马烈)